

• 社会学研究 •

从摆动到流动:人口迁移过程中的适应^①

王晓毅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 移民已经成为缓解生态脆弱地区环境压力的重要手段。政府规划的移民工程往往以“稳得住”作为目标,希望将迁移的人口固定在新的区域,但是移民往往需要时间进行选择 and 调适,摆动为移民的选择和调适提供了可能。基于中国云南和青海两个移民案例的研究表明:(1) 摆动可以为移民提供选择的机会;(2) 摆动有助于移民适应移入地的环境;(3) 摆动过程中,不管是返回或停留在移入地,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都会发生变化。生态脆弱地区的人口迁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政府的政策需要从硬性的移民规划转变为软性地支持人口流动。摆动应被看做是人口流动适应的一个重要方面,引起决策者的关注。

关键词: 移民; 摆动; 适应; 生态

中图分类号: C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860(2011)06-0050-05

从20世纪80年代,出于扶贫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有越来越多的人口被从原来居住的地方搬迁出来。这些移民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首先,移出地往往是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地区,生产条件恶劣;第二,国家通过一系列政策支持移民的搬迁,并采取措施帮助移民转变生产方式,从而帮助移民实现在移入地定居。“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被作为衡量移民项目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②。但是,在大多数扶贫和生态移民的项目中,移民在迁出地和迁入地之间的“摆动”却是经常发生的。如果从移民项目的目的来说,移民没有被固定在移入地

经常被看做是移民工作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标的标志,因为摆动使移民有回迁的可能,从而影响实现移民目标;但是如果从移民本身发展来说,摆动可能是移民的有效生存策略,可以帮助移民选择适当的生存方式。一些移民的经验表明,回迁并不是移民单纯地回归原有的生存策略,在摆动过程中,移民会做出许多相应的调适。本文基于作者在云南和青海的调查,试图回答摆动如何改变移民的生存策略,并在此基础上提供一些政策建议。

收稿日期:2010-11-03

作者简介:王晓毅(1961—),男,北京密云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

①本文在云南的调查得到了香港乐施会的资助;在青海三江源的调查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资助。香港乐施会张慧敏、陆文波和哈希·扎西多杰分别在云南和青海的调查给予了大力支持。

②据报道,宁夏自治区《关于进一步扶持生态移民新村发展的若干意见》,10条新规确保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农民日报》2010年8月17日)。

一、摆动与适应——云南赛林村的故事

赛林村是云南保山的一个傣族村寨,因为地处高黎贡保护区的核心区和泥石流高发区,在2004年进行了整体的搬迁,但是在2008年,部分村民又重新回到原来的村寨。回迁并非简单的回归过程,在搬迁和回归过程中,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都进行了调整。

赛林村的傣族农民原来是居住在山上,从事游耕的少数民族。从20世纪80年代,他们逐渐定居下来,从事农业生产。在作者调查的时候,共有76个农户。居住在高黎贡山上的傣族主要种植玉米,且产量比较低。村民主要依靠1300亩山地种植玉米,其中的1000亩据说不属于村庄,而是属于保护区的国有林地。

由于地处保护区的核心区,且生产条件比较艰苦,保护区早就希望将这个村庄整体搬迁,因为人为干扰经常被认为是影响环境保护的。但是由于种种困难,搬迁一直没有实现。2004年的大暴雨引发了山体滑坡,泥石流造成了靠近山体的两家房屋倒塌,死亡两人。泥石流给搬迁提供了机会,村民由于担心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的发生而同意搬迁,而政府不仅有理由动员村民搬迁,而且也争取到了项目资金的支持。

为了进行赛林寨的整体搬迁,隆阳区扶贫办组织了多个部门整合资金,在潞江坝区为村民安排出村庄用地,这块地方距离村委会所在地很近,距离原来山上的寨子有12华里。每个家庭在新的赛林村都得到了差不多四分地的一块宅基地,政府按照他们在山上房屋的面积,在山下统一修建了住房。政府统一修建了自来水,并且动员香港乐施会的资金修建了沼气池。由于所修建的房屋没有门窗,在搬迁的时候,村民把山上房子的木料拆下来,装修了山下的房屋。从2004年发生滑坡,到2005年逐渐开始搬迁,到2008年我们调查的时候,经历了大约四年时间,似乎经过一个循环,大部分村民已经将生活中心重新转移到山上,甚至有个别村民已经开始在山上重新修建房屋,村口的小卖店在关闭两年以后也重新开业,山上远比山下更热闹。

村民在搬迁以后重新回归山上并不是简单地回归,搬迁带给村民的影响是巨大的。搬迁使这个原来居住在深山的村寨形成了两个中心,村民在两个中心之间摆动,一些村民已经开始走出深山,将生产生活的重心迁移到山下,另外一些村民重新回到山上。回到山上的村民也发生了变化,玉米的种植面积大量减少,更多的山地被种植了多年生的核桃树、咖啡和草果(一种多年生的草药)。

在搬迁以后,多数村民并没有在山下解决生计问题,山下没有土地,他们也几乎没有其他的就业机会,从搬迁开始,他们就不得不在山下的住地和山上的农田之间奔忙。对于他们来说,耕地是最重要的,移民并没有在坝区获得水田,他们只能回到山上继续耕种。山上的耕作必须要大牲畜,他们在山下的宅基地面积有限,周边都是傣族人的村庄,像山上一样散放牛马是不太可能的,他们只能把大牲畜放到山上去。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他们生产的中心仍然在山上。此外,山下的烧柴也需要依靠山上,因为他们的农作物和山林都在山上。沼气池的修建多少有些一厢情愿,只有很少的家庭有足够的牲畜粪便可以支持生产沼气,多数家庭都没有足够的原料,山下没有牲畜,沼气就成了无源之水。

搬迁下来居住以后,摩托车的消费成为生产生活中的沉重支出,来往于山上和山下不仅消耗了许多汽油,而且摩托车的折旧也很快,在山上继续种植玉米的成本就变得很高了。也许是下山的一个意外收获,他们了解了经济作物可以卖到更高的价钱,原来在山上并不值钱的核桃居然价格直线上涨,据说一棵老核桃树的核桃就可以有几千元的收入,比几亩玉米的收入都高。既然核桃树有如此好的收益,村民自然就会多种核桃树。原来的老核桃树都已经有几十年的树龄,虽然每棵树都很大,但是数量并不多,而且都在村边路口,几乎没有在耕地上的。现在要发展核桃,村民就开始在耕地上种植核桃。2008年,多数核桃新栽种还没有进入盛果期,在核桃树中间还套种着玉米,但是已经可以看到,玉米的栽种面积已经大幅度减少了。

除了核桃以外,村民种植最多的是咖啡和

草果 这两种经济作物面积也迅速扩大 经济作物的种植逐渐取代了玉米的种植。对于林区来说 种植经济作物与玉米具有不同的意义 玉米需要耕作 被认为会造成水土流失 威胁保护区的林业资源; 而经济作物是多年生的作物 无需每年耕作 可以大大减少水土流失 与保护区的冲突并不严重 特别是核桃树本身就是树 增加核桃树的种植面积实际上也扩大了林地。

但是除了回到山上以外 还有另外一些人留在了山下 几乎不再回到山上去。留在山下的人多是在山上土地不足的人。在土地分配中 一些人的土地位置不好 耕作困难 在上山生活的时候 粮食产量就比较低 而且他们的耕地不适合种植经济作物 这些人宁可将其薄的耕地转给其他人耕种 不愿意回到山上去。此外还有一些人由于不断分家 山上的土地面积很小 也不得不留在山下寻找其他的收入机会。他们也许并不喜欢山下的生活 但是在山下他们还可以找到一些帮工的活来维持生计。怒江河谷地带傣族人的水田比较多 需要帮工 这些缺少土地的傣族农民提供了傣族所需要的劳动力。

相对于山上和山下的村民来说 更多村民是处于流动状态的 他们往返于山上和山下。山上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生计 山下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社会文化生活。许多家庭之所以要留在山下是因为他们的孩子要上学。学校设在山下的村委会 学生年龄比较小 需要家长的陪护 搬迁为学生上学提供了方便; 此外 在新村建设中 在山下新建了教堂 新的教堂更方便信教群众的活动 经常举办各种宗教的学习 信仰基督教的傣族村民就会经常到山下的教堂参加活动。

山下的就业机会也吸引部分村民 一些家庭劳动力比较富裕 年长的家长经常往返于山上和山下 照料他们的经济作物 而年轻的子女多留在山下 偶尔会找到一些打工的机会。尽管打工不稳定 而且收入有限 但是因为山上的耕地也不需要太多的劳动力 年轻人也就留在了坝区。

我们看到 长期居住在高山上的傣族农民 经过搬迁中的摆动 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 。

不同的人在摆动过程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生存的环境 适合山上生存的村民回到了山上 适合山下生存的村民留在了山下。但是即使留在山上的人也不再是处于封闭状态 他们经常往来于山上山下之间 生活范围被大大拓展 生产活动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原来由于定居在山上 与保护区有许多矛盾 现在这些矛盾得到了缓解; 而且这种摆动也避免了一些移民村庄在移民以后出现的贫困化和社会矛盾的激化。

二、游牧与搬迁

青海三江源生态移民的逻辑与赛林村的移民基本一样 都是认为人口过多导致了过度利用自然资源 从而造成了生态环境的退化 因此需要通过移民减少保护区内的人口。此外决策者也认为移民有助于提高牧民的生活水平增加他们的收入。但是生态移民也遭到了许多批评 批评者主要指出 生态移民没有给牧民创造出稳定的就业 许多牧民停止饲养牲畜搬迁到城镇周边以后 没有增加收入的手段 他们的生活水平严重下降 有许多甚至陷入贫困。

上面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讨论都是以一种静态的角度观察 把农牧民当成政策的被动接受者 在生态移民的过程中 由于外界的政策 他们原有的生计得到了改善或者恶化。这忽视了移民本身的能动性。我们看到 尽管生态移民并没有能够真正解决他们的可持续生计问题 但是在移民点与原有乡村之间的流动会使他们获得生存的空间。

游牧民族并没有固定的居所 他们历史上就习惯于移动 我们作调查的索加乡原来就没有固定居民 由于靠近三江源的核心区 一些藏族猎民在这里从事狩猎。只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 受到政府的安排 一些从事畜牧业生产的藏族人从其他地方搬迁到这个地方 并逐渐定居下来 这些定居的牧民也经常处于流动中。在三江源保护区成立以后 政府开始组织村民的搬迁。搬迁的村民被安置在不同地方 有些在乡镇周围 有些在县城附近 更有许多被集中搬迁到了格尔木市区附近。我们在访问中发现 搬迁并不意味着牧民与牧区的关系被完全割

断,许多牧民仍然生活在牧区与移民点之间。

最直接反映移民流动的是移民村的房屋。据说现在移民点的居民结构与当年的设计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房屋的主人名字并没有换,仍然是第一代移民,但是一些房屋的实际居住者已经更换过很多人,甚至可能被转手2—3次。原来的移民之所以选择离开,是因为他们在移民点新村没有找到就业的机会。

移民并没有融入城市,很少有移民在城市中就业的。即使在格尔木市附近的移民也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机会。移民点离格尔木市区还有10多公里的路程,移民进城还要通过一段收费的道路,进城打工并不容易。许多移民在把搬迁之初处理牲畜和家产的收入花光以后,就陷入了生活的窘境,依靠移民补贴,尽管补贴在不断增加。许多移民以来自牧区的收入维持移民的生活。

生态移民本质上是用城市安置来换取牧民减少牲畜饲养数量,减少或停止利用草场。对于牧民搬迁以后的草场,不同的县有不同的规定,有些县规定草场要统一收回,有些地方对草场没有处理,但是不管如何规定,多数草场仍然被继续利用。在我们的调查中,牧民在搬迁的时候都将草场转给亲戚和邻居使用,而将部分或全部的牲畜寄养在亲戚或朋友家。有些家庭更是形成了家庭内部的分工,一部分人搬迁到移民村,另外一部分人继续留在牧场。三江源的牧民往往不是以小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的,家庭之间的合作普遍存在,比如兄弟之间,兄长举家搬迁到移民村,而弟弟继续留在牧区放牧牲畜;或者岳父母举家迁移到了移民点,而留下女儿女婿一家继续看护留下的牲畜。进入移民新村以后,生活支出明显增加,没有来自牧区的收入支持,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

牧区与城市之间的交流一直存在,向城市的流动并不是开始于生态移民,在这之前,牧民为了一些必须的社会需求就要不时地进入城市。像我们访问的达娃多吉,早在移民项目开始之前已经搬迁到城镇。孩子要到城里上学,自己身体不好,要去城里看病,他就将牲畜托付给朋友,自己带着全家到城市边上搭了个帐篷。尽管生活很困难,但是对于游牧民来说,似乎也

很习惯,游动到城镇周边与游动到其他地方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只是在城镇周边无法放牧。当他听说有了生态移民项目,可以有房子,还可以领取补贴,就报名成为了生态移民户,现在他住在移民的房屋,有移民补贴,他觉得很满足,因为在这之前他一直居住在帐篷里面。对于他们来说,移动并非很难,因为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处于游动状态中。只是生态移民的设计并非要他们处于移动状态中,而是要将他们固定在一个地方。移动并非是困难的原因,被固定下来才是困难的所在,摆动就成为移民保持移动的策略。

三、摆动与移动

我们看到,移民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农牧民扩大了移动的范围。在移民之前,他们多囿于原有的村庄,在移民以后,一些人融入新的生活,寻找到了新的就业机会。对于这些人来说,移民无疑给他们提供了机会,不论是为傣族人种田的傣族农民,或者在外面找到活干的藏族牧民。

更多的人是从摆动中受益。在新的移民区和原有村庄之间的摆动,使他们一方面可以得到原有社区所没有的机会,如教育、医疗和打工机会,同时因为他们保留了原有社区的资源,这可以帮助他们避免进入新环境中的风险。在上述两个故事中,移民并没有隔断他们与原有社区的联系,也没有将他们原有的资源剥夺,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可以继续利用原有的资源,从而在两种资源中获益。

更重要的是,摆动为他们提供了适应的机会。高黎贡山的傣族农民和三江源的藏族牧民原来的生活世界距离现代城镇生活是比较远的,他们长期从事农业或畜牧业,远离现代城市生活,改变他们原来的生活无疑是困难的,把他们投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他们不可能立刻适应。摆动给他们提供了适应的时间,使他们可以在摆动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空间。一些人在摆动中逐渐熟悉了新的环境,从而融入了新的环境;也有一些可能经过摆动,最终回到原有社区,即使回到原有社区,他们在摆动中也

许吸收到了许多新的东西。

事实上,我们看到 移民与游耕或游牧的文化并在没有内在的冲突,因为移动不仅仅存在于游耕和游牧文化之中,而且也存在于现代化过程中。现代人具有更强的移动性,部分农牧民从原有社区中移动出来正是代表了这样的趋势。但是问题在于,生态移民政策的本意并非是增加农牧民的移动性,而是希望在新的地方将农牧民重新固定下来,特别是固定在城镇附近,摆动和移动都不被鼓励。一旦他们像决策者所设计的那样定居在某一个地方,他们的收入经常会减少,社会不稳定性将增加。

许多移民在进入新的环境以后会陷入贫困,因为新的环境不必然给他们提供机会,他们的社会资源仍然在原有社区。生态移民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这些地区的二三产业发展滞后,城镇中的非农就业机会普遍比较缺乏,城镇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非常有限;同时,大量移民自身的教育程度、生活习惯也不适应城镇的就业需求。当农牧民被集中到城镇以后,他们很少能有稳定的就业。赛林村的农民只是从山上搬迁到了山下,除了帮傣族农民种田以外,周边没有就业渠道,一些傣族的年轻人被介绍到远方城市的建筑工地打工,但是他们因为不适应,几乎所有的人都放弃了工作,重新回到村庄中。三江源的移民也曾经试图寻找工作,移民村的村长曾说,为了增加收入,他们去建筑工地打工,也组织一起去采集冬虫夏草,但是一直没有

稳定的就业机会。

原有社区的生产和生活是复杂多样的,不同的农牧民有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生存策略,而生态移民希望通过国家的介入,创造出标准化的移民新村。但是不同的移民有着不同的需求,这也就造成了村民的继续流动,一部分人可能会离开新村,继续流动到其他领域,而大多数村民可能会依靠与原村庄的联系克服其所遇到的困难。

现在的移民规划总是试图把移民固定在某个地方,用定居代替移动,这种规划方式经常被移民颠覆。移民基于自己的生存策略,力图保持游动状态,事实证明,游动状态有助于移民的适应。生态移民不同于大型工程移民,在移民以后,村民原有的资源仍然存在,并且可以被继续利用,而大型工程移民,比如水库移民,在水库修建以后,村民的耕地就不复存在。在生态移民中,通过摆动,原有的资源就可以被利用以帮助移民减少风险,使他们更容易适应。

生态移民需要转变思路:第一,生态移民应更为关注摆动,摆动有助于移民适应;其次,移民要关注提高移民的流动性,而不是简单地将移民固定在一个新的地方;第三,鼓励流动来代替直接的生态移民,会减少大量浪费,使生活在生态脆弱地区的农牧民可以有更多的机会选择。

责任编辑 周文彬

From Swinging to Mobility: Adaption in the Migration

WANG Xiao-yi

(Sociological Institute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Beijing 100732 , China)

Abstract: Migrant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to ease the environmental pressure in ecologically vulnerable areas. The migration project planned by government always aims at stability and hopes to settle down the migrants in new areas but it needs time for those migrants to choose and adapt themselves while the swing makes it possible. The study of migration cases in Yunnan and Qinghai provinces manifests that first, the swing can offer migrants an opportunity to choose; second, the swing helps migrants adapt to the new environment; third, in the swing process, their lives and production will change whether they return or stay. The migration in the ecologically vulnerable areas is a long-term process and therefore, the policies should change from hard migration design to soft support for the migration. The swing should be considered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igration and should arouse attention from policy-makers.

Key Words: Migrant; Swing; Adaption; Ecology